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第5辑 · 2015)

卜宪群 王建朗 张顺洪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第5辑·2015)

卜宪群 王建朗 张顺洪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第5辑, 2015/卜宪群, 王建朗, 张顺洪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ISBN 978 - 7 - 5161 - 8949 - 8

I. ①马… II. ①卜…②王…③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IV. ①A851. 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746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418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编委会

主 编 卜宪群 王建朗 张顺洪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沛	马克垚	刘家和	乔治忠	步 平
张海鹏	陈高华	陈祖武	郑大华	庞卓恒
林甘泉	赵文洪	彭树智	廖学盛	瞿林东

前 言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重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并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智库）、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2009年初决定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后，一方面注重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机构的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的研究室和中心等；同时又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从2011年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每年收录全国范围内相关学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集中展示相关学科研究的优秀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

2015年1月

目 录

理论方法论探讨

- 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叶险明 (3)
- 列宁“帝国主义论”: 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姜 安 (27)
- 中国近代以来第三次伟大历史变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王伟光 (53)
-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 左玉河 (70)
- 为人民群众而研究历史
- 《求真务实六十载——历史所同人述往》序 卜宪群 (101)
-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 兼评历史虚无主义 卜宪群 杨艳秋 高希中 (111)

唯物史观与史学发展

- 唯物史观会抹杀学术个性吗 陈其泰 (119)
- 生产关系的地理学叙事
- 当代唯物史观空间解释的张力 胡 潇 (121)
- 论阶级斗争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 and 当代价值 田心铭 (134)
-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胡逢祥 (148)
- 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曹小文 曹守亮 (166)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与学习

-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研究的双重视角 陈先达 (185)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奠基之作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

宗教观研究 加润国 (200)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

简要历程探析 王海军 (229)

新中国历史学研究

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 刘林海 (241)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与趋向 张旭鹏 (265)

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 陈其泰 (280)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

——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张 峰 (300)

略论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调查 赵庆云 (309)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史学著作

郑天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段晓亮 (333)

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 周文玖 (345)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探索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对马克思主义

史学理论的贡献 邹兆辰 (363)

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的日子里(上) 林甘泉 (374)

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的日子里(下) 林甘泉 (378)

《中国近代史》教材(“马工程”系列)编写的

有关问题与思考 张海鹏 (382)

理论方法论探讨

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叶险明

一 从一个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失语的重大问题谈起

从世界范围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马克思学说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理上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主要还不是来自各种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而是来自原西方“新左派”（或“新左翼”）的某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学说。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深受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的启发，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弗兰克提出了所谓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这种世界历史观在弗兰克 1998 年出版的个人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应当承认，弗兰克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的确包含一些合理因素，它对人们重新审视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问题是：在其上述代表作中，弗兰克将马克思学说认定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代表之一，对其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批判，似乎不做这样的批判就不足以构建起“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

弗兰克把马克思学说视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主要论据有三：一

^{*} 该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X004）“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的阶段性成果。

是在马克思看来,东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的;^①二是马克思认为“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②三是马克思持有“欧洲独特论”,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只在欧洲内部才能产生。^③基于这三个主要论据,弗兰克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马克思“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这种“神话”构成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框架,并被滥用到东方世界。它配合了“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的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普遍主义”。^④“‘东方’——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是,基本上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术语下争论同样的问题。这种争论甚至比西方的争论更徒劳无益,因为它陷入了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概念无休止的争论。……他们在无休止争论时会掩饰这些概念,使之适合现实。于是就发明了各种变体和组合,如‘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这些概念迫使“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理论学者辩论‘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必经之路’”,^⑤“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到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⑥所以,在弗兰克看来,不仅马克思的学说,而且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西方中心论”。众所周知,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理论著述活动的主体和主线,“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蕴含在其中。因此,把资本主义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神话”,也就是在逻辑上对马克思学说以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彻底否定。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获得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

①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39、39、446—447、44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书奖的头奖,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当然,这种反响也包括对其批评。沃勒斯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把弗兰克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斥之为“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2000年该书在我国翻译出版,同样也引起了较大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这种反响只是主要出现在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领域,^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除了个别赞誉和“口号”似的不痛不痒的零星回应外,迄今依然“静悄悄”。也就是说,面对弗兰克“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从本质上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否定,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整体上一直“缄默不语”。

在笔者看来,造成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上述尴尬状态的原因或许有四:首先,弗兰克对“西方中心论”在形式上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也有其合理之处),往往使不少人易于在情感上忽略或包容了他在其中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否定。所谓“在形式上的否定”是指:拒斥了“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话语成分,^②而没有真正拒斥“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 and 话语系统(见本文第二部分)。其次,弗兰克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颠覆”主要不是基于政治立场上的“颠覆”,而是

① 自《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在我国翻译出版十多年来,对弗兰克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我国学者从世界史学科的角度探讨得比较充分。对其赞誉的有: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质疑了“亚洲停滞论”,以一种“全球视野”观照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并为解释欧洲崛起提供了新视角,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重构了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从长远的历史视角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等等。对其批评的有: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白银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其新奇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这本书都大有讨论的余地,等等。(参见何爱国:《〈白银资本〉研究综述》,2009年2月26日, <http://1w.china-b.com/wxwh/20090226/409187-1.html>, 2013年8月15日)可以认为,从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对弗兰克相关思想研讨的状况来看,弗兰克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合法性的否定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

② 应当承认,“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成分的确包括“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等。“西方中心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从有关“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的话语成分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为此,弗兰克干脆彻底否定这些话语成分的真实性,似乎这样一来“西方中心论”就会被批得“体无完肤”了。但实际上,在词语上否认“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上否定“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成分(如“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等)并不等同于“西方中心论”。

基于话语表述形式上的“颠覆”，而且，他把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所有相关著名西方学者的学说混为一谈，都称为“西方中心论”，故而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对马克思学说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合法性挑战的严峻性。再次，弗兰克是在构建所谓“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的旗号下“颠覆”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其中一直夹杂着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在1800年以前世界历史中所起作用的赞誉，^①以及对它在21世纪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将要起的作用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推崇，这就使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人对弗兰克的挑战视而不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弗兰克把马克思学说视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主要论据，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目前还难以从正面提出科学的分析和反证。之所以如此，与缺乏对马克思批判“西方中心论”过程的阶段性和其逻辑前提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理解上的偏差，有直接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整体上尚未有应对挑战的足够思想准备，应该从学理上正面回应弗兰克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强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及其科学性的研究，但如果我们连弗兰克的上述挑战都应对不了，那么我们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研究就的确涉嫌“自说自话”了。

笔者认为，可以把弗兰克提出的认定马克思学说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三个主要论据，置换为两个学术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有“东方社会停滞”等词语表述是否证明马克思就是“西方中心论”；马克思是否把资本主义仅仅视为西欧社会的“特产”。笔者在这里并不打算专门评论所谓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而是想就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学术问题，以及目前我国学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的误解，从正面展开对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的探讨。^②

① 虽然在1800年以前，东方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所占据的优势已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这一“历史事实”在弗兰克那里只是重述了国内外学界早已有的相关成果。

② 关于资本主义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本文不打算涉及，因为这是个假问题。只要充分证明马克思学说不是“西方中心论”，弗兰克关于“资本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的论断就会“不攻自破”。

罗伯特·布伦纳曾就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说过一段值得我们回味的話：“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它为什么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些问题上各种矛盾的解释明显已经超越纯粹的历史研究的兴趣。它们影响到对今日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定位的评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概念问题。更进一步，这些争论涉及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比如历史决定论的性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有效性等问题。”^① 如果将罗伯特·布伦纳这段话转化为笔者的语境，那就是：本文所提出并要探讨和阐释的问题，其意义和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技术”上的甄别，在方法论上直接关涉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合法性基础的正确认识。

二 “西方中心论”的三层含义与马克思对 “东方停滞”说的超越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弗兰克的理论在客观上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即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的视域，来把握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及科学性。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认为，可把“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加以考察：一是基于对“西方中心论”层次的科学分析，昭示马克思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超越“东方停滞”说的过程；二是基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把握，揭示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由西欧推及整个世界、彻底批判“欧洲独特”说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这里考察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从文化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其学说创立和发展的时代，也是“西方中心论”在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开始占绝对统治

^① 转引自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当然，罗伯特·布伦纳这段话中也有不准确的地方需要纠正，即“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它为什么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应为“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它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

地位的时代,因此,马克思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必然离不开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①可以说,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在逻辑上贯穿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理论著述活动的始终。关于马克思创立自己学说时期如何科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问题,笔者在有关文章中已做了详尽的阐释,故不赘述。^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一生著述活动中,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是一个阶段性的复杂过程。而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科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过程,就必须对“西方中心论”的层次加以科学分析。这是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科学批判“西方中心论”过程的逻辑前提。不清楚这一点,不仅会把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简单化,而且也会在整体上曲解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弗兰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

迄今为止,作为一种术语的“西方中心论”在国内外学界使用得比较混乱,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价值理念甚至政治立场,对“西方中心论”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故这一术语或多或少有被滥用的倾向。这显然不利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认识和批判,当然也不利于对马克思科学批判“西方中心论”过程的正确认识。一般说来,“西方中心论”有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层次。一是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宽泛地讲,种族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和观念,即“它相信政治的和社会的结论都能够从‘人类划分为在生物学上有差异的许多种族’这个观念中推导出来。可见,种族主义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假定有两个:第一,在世界各民族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基因或种类差异——种族差异是有意义的;第二,这些基因分化,反映在文化、智力和(或)道德差异中,就有着政治的和社会的重要性。种族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在理论原则上,则鼓吹血统优越论或血统卑劣论(如亚利安主义或反犹太主义)。”^③当然,严格地说,“西方中心论”并

① 马克思以前,欧洲思想发展曾经历了持续200年的“中国热”,“中国”已为欧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详。在德国,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到康德和黑格尔,走过了一个对中国从崇敬颂扬到批判反思的历程。如果说当年莱布尼茨学派对中国持褒奖态度的话,那么,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黑格尔则对中国进行了辛酸的嘲讽和严厉的批判。这无疑对当时的马克思有一定的影响。

② 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③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不等于种族主义，但它又与种族主义有“扯不清”的联系。如“西方中心论”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孔德就把作为其历史研究对象的“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视为“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笔者正是据此而提出“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这一概念的。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是最原始的“西方中心论”。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种族主义也有“野蛮”与“温和”之分。笔者所说的“温和”的种族主义也称“新种族主义”。“新种族主义”不提人种的优劣和种族奴役，而是强调种族文化的优劣，把对非西方文化的歧视编码到对其的描述中，制造和崇尚话语及符号暴力。在当代，在种族主义意义的“西方中心论”中，“新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占主导地位。

二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一般不再简单提及种族文化的优劣，虽然其基本原则中蕴含着对“新种族主义”所强调的种族文化差异的认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其主旨在于直接为欧美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统治和扩张的合理性及永恒性做论证。它把西方视为现代世界的本源和现代世界进步的引领者，认为世界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或西方界定，因为，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主动创造者。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只有西方具有发出行动的能力，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做出反应（即世界其他民族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社会发展的轨迹）。所以，西方承担着向世界传播由其所创造出来的文明的责任，故它自然就一直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则一直处于边缘或外围。如果说，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也能有所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发展也只能是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扩展。

三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是一种在思维的习惯性范式和长期的文化偏见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话语环境，与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或认可这种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影响的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无直接的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以“东方停滞”说和“欧洲独特”说为两大支撑点，把历史上的进步和落后绝对化。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比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都要大得多。之所以如此，就在于

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更容易渗透到人们的文化和情感中。在西方和东方的知识界,许多知识分子反对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却难以摆脱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其主要表现是:他们或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来反对种族主义意义上的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或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反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和其所论及的一些问题以及人们暂时受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①与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是有区别的。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抑或说,不能把前者简单地称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笔者认为,正确把握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过程,必须以对“西方中心论”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前提,否则,就会把“西方中心论”泛化。实际上,“西方中心论”只是一种文化形态。从社会认识论角度看,它是对近现代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其影响范围主要限于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故它不等于也不可能等于现实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同时,即便对它在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影响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把其对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影响也一概视为“西方中心论”本身,正如不能把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西方学界的影响一概视为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一样。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的历史。

毋庸置疑,马克思在初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不仅在方法论上深刻批判了第一、第二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②而且也在逻辑上

① 笔者这里所说的“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是指:被“西方中心论”在不同程度上所“过滤”过的历史材料,它诠释了“西方化”的东方,如:远离文明,愚昧、停滞等。

② 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其主要根据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拒斥了民族和民族文化在整体上有优劣之分的观点;深刻地批判了“德国中心论”的“虚假的世界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合理性和暂时性(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这三个方面足以说明,马克思在初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